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特别报道

编者按

战争是教育的最大破坏力量，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却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逆势发展”的一大奇迹。在那个国破家亡的凄惨年代，团结抗日的中国各阶层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国家对于教育的巨额投入仅次于军费开支，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在战乱中发展、在困难中壮大，历经八年全民抗战，既实现了中国教育数量的大增长，更实现了中国教育质量的大提高。尤其是许多学人在西迁大后方后的艰苦环境条件下潜心办学和求学，坚持科学技术和国学艺术等文理科的常规教育不动摇，不但培养了服务于抗战需要的大量应用型人才，更培养了一大批功底扎实的科技英才和人文社科大师，为战后重建及未来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十多万件文物大转移十余年无一毁损为典型的中华文化血脉传承，以抗战剧为代表的新兴艺术形式的兴起等等，也都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在非常时期的大发展，增添了一抹引人注目的异彩。

文化西迁：战时教育的华西坝现象

■ 潘媛 王越

学者岱峻发现李庄后，发现了一段“衣冠南渡”的学术史。李庄诱他深入，逐渐钻入了另一个迷人的时空——抗战时的华西坝。岱峻坚信，这是另一所西南联大，规模同等，风流不输——它为抗战时的陈寅恪、萧公权、钱穆、梁漱溟、朱光潜、顾颉刚、张东荪、吕叔湘、吴宓提供过一床一被，一尺讲台，成就了战时极其困难条件下的办学佳话。

穿越沦陷区“五大学”汇聚华西坝

1937 年 11 月，金陵大学的校长陈裕光在教育部的斡旋下，分租三艘轮船驶离南京抵达汉口，于 1938 年 1 月 7 日入川，3 月开学。随后迁来的是齐鲁大学。最后到达华西坝的是燕京大学，1942 年春天，师生们冒着危险，穿过沦陷区向成都新校址行进，有的甚至是一路乞讨而来。

不过，彼时的华西坝已经被较早到达的几所大学捷足先登——中央大学医学院（后迁成都后子门）、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再加上“坝主”华西协合大学，挤得满满当当，只好允许教师跨校讲学，学生自由选课，各种讲座、团契组织令人目不暇接。

地方实在不够用，燕大只好租陕陕西街的华美中学校舍及附近的民房。华西坝有课，陕西街也有课，课间 20 分钟，那时大街上常能见到一路小跑的学生。

辛苦奔波的并非只有燕大学生。金陵大学部分男生宿舍在红瓦寺，距坝上明德楼有五六里，只有一条晴天扬尘、雨天泥泞的土路相通。于是校长陈裕光带领师生上阵，历时数月，筑成一条“金陵路”，沿用至今。

战时文化西迁，汇聚后方的文教中心，除昆明，犹有“三坝”之说：即汉中的古路坝，重庆的沙坪坝和成都的华西坝。

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 1938 年辗转迁汉中，以古路坝为中心组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因环境艰苦喻之“地狱”。沙坪坝有重庆大学、教育学院，及内迁的中央大学、上海医学院等校，形同一座大学城，故称“人间”。

而华西坝，因地处天府之国，美其名曰“天堂”。那段岁月，史称坝上“五大学时期”，英文叫“Big Five”。

三千学生苦中作乐成就众多大师级学者

五所大学的办学规模 and 教学质量并不逊

战时高校西迁，辗转到最后继续办学，当年会聚在成都华西坝的五所大学其办学规模 and 教学质量，并不逊于声名卓著的西南联大。



于西南联大——联大学生 3000 人左右，有 5 个学院（文、理、法商、工、师范），26 个系；坝上五大学也有 3000 学生，5 个学院（文、理、医、农、教），60 多个系。

较之国立大学关注国计民生，教会大学的学术视野更开阔。燕京大学新闻系是整个亚洲最好的新闻系；华西协合大学的人类学研究形成了影响至今的华西人类学派；金陵女大的女子教育培养了一批女科学家、女将军、女教育家……

岱峻家紧邻华西后坝，晚饭后常去散步。坝上风光依旧，而世事已迁，令他感怀，“暗想当初，有多少忧欢佳会……”民国文人称华西坝为“坝上”，就像称上海为“海上”、“沪上”，管杭州叫“湖上”，以之指代整座城市。

旧时华西坝的范围，远大于现今的四川

大学华西校区，但为了安顿下骤然而至的几千名师生，原本清幽的华西坝变得杂乱。健身房改成阶梯教室，又见缝插针地修建临时宿舍，还不够住，便要去租民房、道观、文庙。往往是脚下泥地、头顶天空，中间漏风，臭虫自然少不了。叶圣陶给朋友写信说，华西坝“洋楼密树，似颇舒适，而臭虫作祟，夜不得安眠，大是苦事”。

坝上的生活，苦中作乐的成分居多。学生们要去黄门街茶馆一条街，看书，打桥牌，一杯盖碗茶喝上一天，要踢足球，打篮球，打网球，跳舞，开运动会。但与此同时，也得躲警报。

设在华西坝明德楼的园艺系十分招眼。他们在园艺场试种花卉果蔬，包括西红柿、洋葱、花菜等当时的珍稀蔬菜。在李庄的梁思成，专门前来索要西红柿种子。番茄炒鸡蛋也成了华西坝最有名的一道菜。

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蒋旨昂，在石羊场建立社会研究实习站，提供书报杂志阅览、医疗服务和乡村托儿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社会学系在小天竺街创办儿童福利实验所，在中和场建立乡村服务处。周围很多小孩子头长癞痢，学生们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他们洗头、敷膏药，直至痊愈。

到今天我们回头看，若没有华西坝五大学，成都牙科不可能成为亚洲最好的牙科；老成或许会晚若干年才能喝到牛奶；我们也不会有幸福梅林——据考证，今天成都江津、金堂的广柑、龙泉的水蜜桃、华西牛奶、幸福梅林的梅花，皆是拜当年五大学先贤所赐。

既有大厦也有大师陈寅恪讲课海明威演讲

那时候的华西坝，不仅有大厦，也有大师。人文学者有陈寅恪、吴宓、萧公权、李方桂、钱穆、顾颉刚、许寿裳、蒙文通、吕叔湘等；理工科有生物学家刘承训，地理学家刘恩兰，数学家赖朴吾、魏时珍，天文学家李晓舫，皮革学家张铨等。还有卜凯先生，首创了中国农业经济系。小麦育种专家沈宗翰先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袁隆平。至于医学家戚寿南、侯宝璋、林则等等，更是不胜枚举。

收集资料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日记和史料中在提到某一位教授的时候都是：xxx,xx 大学 xx 专业教授，兼任 xx 系主任或院长——行政职务永远在后面。这就是教授治校。

来成都以后，吴宓搬了三次家。初来时他住燕大文学院院长马鉴家，随后就迁到了燕大男生宿舍，条件极差。一年后搬到陕西街，住进去又沮丧了，写诗：虽是高楼，但“装潢犹浴室”。最后他向校方说明情况，再搬家。这次

总算如意了，再写诗：“高楼得净室，明爽可安居”。

对陈寅恪来说，来到坝上，也颇为曲折。先在西南联大，后去中国香港准备去英国，又不能成行。在香港，他带着夫人和三个女儿艰难万分，缺钱买飞机票，还生病。论关系， he 本是迁到李庄的史语所的一组（历史组）主任，但那里条件艰苦，缺医少药；夫人有心脏病，昆明海拔太高；重庆又需要爬坡上坎，这对他和夫人都困难。只好去广西大学，但战火又逼近，于是离桂林，滞留贵阳，抵重庆，最后是好友找了辆运军火的大卡车，把陈寅恪一家送到了九眼桥附近的南光机械厂。陈寅恪的女公子陈流求现在仍定居成都。

陈寅恪在坝上开有“魏晋南北朝史”、“唐史”、“元白刘诗”。他一身长袍马褂，一手拿黑布包袱，一手拿一瓶冷开水步入讲堂，“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有人指责陈寅恪讲课内容低俗。他讲《长恨歌》，先讲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殊不知他是从民俗引出唐朝婚礼制度，从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两方面论述大唐帝国的历史。

在抗战的大背景下，讲台并不拘于教室。从 1941 年开始，坝上就举办了系列学术讲座，先是华大文学院院长罗志忠，然后钱穆、冯友兰、张东荪、侯宝璋等竞相登台，写小说的张恨水也身着长衫、足登布鞋前来演讲。他手捏一把折扇，俨然一读书人。

真正在坝上掀起热潮的还是两名“洋先生”。1941 年春末，海明威访问中国。在华西坝体育馆，面对挤得水泄不通的听众，海明威吼叫般作了演讲。其后是“李旋风”，1943 年，李约瑟在坝上进行了 12 场演讲，一直持续二十多天，观者如潮。

1945 年的一天，久病的陈寅恪忽然闻到了床头的海棠香，心有所动。到了 8 月 10 日，盛传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他悲喜交加，写下“何幸今生有此时”。

真正庆祝的时候还是要到 8 月 15 日。那天，四川省主席张群与五大学校长在华西坝款待来访的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席间，一个信差交给张群一封信，众人只听他一声大喊：“哎呀！战争结束了。”

所有人都开始收拾衣物准备归乡，但是学校真正开始回迁还是要等到 1946 年。即将复员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大、齐鲁和燕京大学共同草拟的一篇纪念碑碑文中这样写道：“抗战军兴，全国移动。华西协合大学张校长凌高博士患敌摧残我教育，奴化我青年，因驰书基督教友校友迁蓉，毋使弦歌中辍。”

抗战八年，弦歌并未中辍，华西坝做到了。



●当年的西南联大旅行团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堪称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不仅培育了学术和思想上的诸多大师，也培养了一批投笔从戎的勇士……

书写教育史上的传奇 输送血战沙场的斗士

■ 孙小宁

战时西南联大的生存环境极为恶劣。日军 1938 年 9 月 13 日首次空袭昆明，此后轰炸不断，联大屡遭损失。经费图书设施极度短缺，学生住房简陋，人多拥挤不堪，每逢刮风下雨，经常屋漏墙倒。教师生活状况同样窘迫，每当有断炊之虞，联大教授们甚至纷纷典当衣物……

人们不禁要问，当时办学条件那么差，为什么能培养出如此多的科技、人文精英？为什么能诞生如此多的重大科研成果？“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这种奇特“西南联大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

一个在战时由几所院校组成的临时学府，经过颠沛流离的三千里远征，最终落脚于昆明。而它坚持教育的时间，正好与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等长，战乱、饥饿、飞机轰炸是战争中的常态，但却无法扼杀他们自由思想的活力。大师由此孕育，他们的轶闻佳话也由此流传。西南联大无疑已成为传奇，但其传奇的本质，却需要我们在无数有关西南联大的文本中细细甄别与体会。

当然，联大人让人心生敬意的还不止于思想和学问。“八百学子去从军”，这其实只是一个普泛的说法——很多人认为，数量远不止八百。那些奔赴抗日疆场的联大人，不乏穆旦、杜运燮这样著名的诗人。当然，还有一些无名的身影，隐没于历史中。

也许对这些无名人士的想象与书写，只能落到小说家身上。云南作家范稳在完成了他的藏地三部曲后，潜心于云南远征军历史的追尋，他从这个脉络接上了西南联大，塑造了一个就学于西南联大，后来参加远征军，同时又在后面的人生中坎坷求生的普通老兵。

从易社强先生一著中看，联大八年，因为正处战争，的确对该学习还是该从军，有过不小的争论。历史证明，那些仍然能够在战乱中坚持做自己的科学研究、醉心于学术的人，最终都为这个民族乃至人类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那种咏唱着“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的诗句奔向战场的另一群人，同样是我们民族精神命脉能够永续的脊梁。只不过和后来返回北平、天津继续求学的同学相比，这一批人因为这一特殊际遇，后来的人生路，变得更加一言难尽。

联大师生参军抗战共有四次投军热潮：1937—1938 年长沙临时大学时期；1941—1942 为配合飞虎队和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作战时期；1943—1944 年为配合印缅战场即滇西反攻时期；1944 年蒋介石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口号时。

1944 年，在蒋介石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下学校开始应征青年远征军，即青年军。在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中，有一个诗人特别值得一提，他就是穆旦。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铮，著名诗人、翻译家，曾用笔名梁真，与著名作家金庸（查良镛）为同族叔伯兄弟，皆属“良”字辈。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其为现代诗歌第一人。那时他已经是联大的留校教师，却主动报名参加了远征军，在杜聿明的第五军军部供职。他参加了后来的野人山大撤退，九死一生。抗战胜利后，写出诗作中的名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

联大从军学子牺牲最多的是参加空军的，地面作战牺牲最有代表性的是外文系诗人缪弘。缪弘有诗《血的灌溉》：“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他参加的是美军战略情报处组建的中美特种部队，在湖南芷江的一次攻击作战中牺牲，用鲜血印证了自己的诗。时为 1945 年 7 月，抗战马上就要胜利了。

自有联大以来共求学 8000 学子，参军抗日的有 1100 多人，每 100 人中有 14 人投笔从戎。这种大动荡、大时代中的学子，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时代如何铸造了他们的气质、性格、涵养，乃至英雄情怀。作为一个作家，我希望能够追寻这些人的足迹，寻找他们在战火中的青春身影。

抗战时期创造的文物搬迁奇迹

1932 年 9 月 18 日，日本关东军突袭沈阳北大营；翌年进攻热河，窥伺华北；1933 年攻陷山海关。形势告急，中国故宫博物院决定将馆藏精品转移，以避战火浩劫。此后 10 多年，故宫的大批珍品文物在南下、西迁的大转移途中，历经了上万公里的漫漫长途，创造了世界文物搬迁史上的奇迹。

提前进行文物的大迁移

1932 年秋，故宫人开始对转移文物的挑选，最终选定的珍品包括书画近 9000 幅，瓷器 2.7 万余件，铜器、铜镜、铜印 2600 余件，还有《四库全书》等各种文献。据介绍，当时故宫人光打包就花了大半年时间。1 万多箱文物每件包装至少有 4 层：纸、棉花、稻草、木箱，有时候外面还套上个大铁箱。这一步骤保证了运输途中不论翻车、进水，损失都微乎其微。

1933 年 2 月 5 日晚，北平全城戒严，故宫博物院的 13491 箱文物从神武门广场出发，由几十辆板车轮流运往火车站。军队全城护送，沿途军警林立，板车在熟悉的街道上行驶，街上空无一人，除了车子疾驰的辘轳声之外，听不到一点别的声音……这批浩大的故宫文物运出北平后，每节车厢都有军警，火车经过的每个分段，地方都会派出军力；一些路段还没有骑兵，沿路跟着火车跑。

随 5 批文物一同离开北平、走完全程“南迁”路的，还有 20 位故宫人。包括马衡、庄尚严、那志良等近 10 位故宫专家，还有一大批工人、眷属。

来自北平的三个博物馆——国立中央博物馆、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的官方书籍和文件，直接被送往首都南京。

翻峻岭，陷泥泞，落激流，遇轰炸……十多万件文物辗转迁移十多年无一毁损，保存了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血脉。



●工人们正在抬运内阁大库整理的档案



●天安门前正待南迁的故宫文物

1936 年 4 月 8 日，出展英国的 80 箱文物从伦敦安全返回中国。这时，一场大灾难正在中华大地上蔓延，迫使这些珍宝不得不再次转移。于是，故宫管理委员会通过了一个方案，即分三路将文物（和政府一起）向西转移到重庆和四川地区。

第一批辗转到贵州的山洞

故宫文物南迁入川，是在兵荒马乱的条件下进行的，途中遭遇了大雪封山、汽车翻覆、船只遇难、敌机轰炸等种种险情，但整个过程中文物几乎没有损伤毁损，也没有遗失盗抢，令人叹为观止。

1937 年 8 月 14 日，曾经运往伦敦展出的那 80 只铁箱子，成了第一批被运出南京的文物中的一部分，这时还是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前，这批文物逃过了被毁的命运。

第一批运出的文物沿长江水路到达汉口，然后用火车运到长沙。几个月内，长沙也危险了，这些箱子又经广西运至贵州——不久，长沙原来存放这些箱子的图书馆就被一颗炸弹夷为平地。

一年后，这批文物被运到了贵州安顺附近的一个隐蔽的山洞里。在这里，此批文物度过了 1938 年到 1947 年间的漫长岁月。

“每到一地都是千难万险。我还记得在去贵州的路上，乌江上有一座桥，下面是湍急的河流，中间是竹子与木板钉起来的桥，过桥时所有的人都要下车，让车慢慢开过去，我们跟在后面，小心翼翼走过去。”当年主持故宫文物南迁工作的庄尚严之子庄灵，在央视纪录片《故宫》里如是说。

第二批迁到乐山农村隐藏

同年 11 月初，第二批文物也在准备迁移。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装箱、装车、把 9369 个箱子运至码头。这一大批文物在 11 月 20 日至 12 月 8 日之间离开南京，几天后，南京被攻陷。12 月 10 日，9369 箱文物通过轮船经长江运至汉口；一天后，汉口

的孔庙（文物箱件曾在这里存放）被炸毁了。箱件继续迁移，3 月份到了宜昌。

文物不得不在宜昌停留几个月等待河水上涨。到了秋天，文物继续转移，穿过险恶的长江三峡到达战时陪都重庆。随后重庆也陷入危机。1939 年春，这些国宝箱件又被装上小木船再次迁移，部分船只由纤夫用缆绳拉着在急流中前进，目的地是四川乐山的安谷乡。

乐山地方志记载，当时还发生了一个意外事故，有一根纤绳断了，船体失去控制，装满国宝箱件的船只连同船上的人员一直被水冲到了下游，庆幸的是并没有太大的损失。这些文物箱件，是由搬运工扛着走去往乐山的最后一段路程的。

第三批刚到成都又去峨眉

第三批文物从南京运出后，经陕西最后被运到四川，这是运送最艰难的一路。

这批文物共 7286 箱，于 1937 年 12 月 10 日日军攻陷南京前夕从南京出发，经陆路由火车运往徐州，接着在 1938 年 1 月到 5 月间又被装进 300 辆卡车运到陕西汉中。

这条线是沿着秦岭行进的，山间道路有时泥泞不堪，有时还会遭遇山崩。其间，一场大雪将整个运输线困在山间，没有食物也没有地方住，幸而后来救援队赶到。运宝大队在 4 月 10 日抵达四川，路上整整花了 48 天。

在去成都的路上，要经过许多交叉的渡口，满载古物箱件的船只逆流而上，只能靠人力拉。

文物在成都的储存地点是东门的大慈寺。没想到刚到成都，又一道命令下来了：要把国宝箱件再运到 130 多公里之外的峨眉山。后来历经艰险到达目的地。（华希）